

◀ 溯源/甘肃 ▶

# 隋唐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

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

隋唐时期,甘肃的音乐、舞蹈艺术中最精彩、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民歌曲子、大曲、散曲、杂剧和俗讲等,它们在甘肃及整个中国音乐史上都有历史性贡献和研究价值。



## 民歌曲子和大曲

民歌是相对于官府乐、庙堂乐、宫廷乐、宗教乐而言的,它是一切音乐的源泉。民歌的内容包括歌词和曲调两部分,民间歌手一般把民歌叫曲子,但真正曲子的歌手比民歌广泛,它除乡间民众清唱踏歌外,还流行于歌伎、宗教徒、教坊、文人之中,经过教坊、文人加工,艺术性更强。

隋唐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甘肃曲子是《阳关三叠》,它的歌词原是王维的七言律诗《送元二使安西》,因诗中有“阳关”(今甘肃酒泉市“渭城”今陕西咸阳市)两个地名,所以取名《阳关曲》或《渭城曲》;又因其曲式结构有“三叠”的唱法,故称作《阳关三叠》。《阳关三叠》演唱的歌词如下: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杨柳春。(一作柳色新)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康熙《御定全唐诗》卷128

诗的内涵是王维在一个细雨蒙蒙、杨柳依依的春天,送他的好友元结出使西安的情境和心情。在艺术上使用比较的手法。作者将帝都近郊渭城同安西两个地名放在一起,提醒这边是春雨春色,那边荒凉而无故人,让读者通过路途的遥远和环境的差异来体会元二这次出使的艰辛;作者用淳朴、接近口语的语言,表达他对行人恋恋不舍、依依惜别的情怀。曲子内容简练,意境深邃感人,容易引起共鸣,因而唐宋元明以来一直被人们所传唱或改编创新。

隋唐甘肃的民歌曲子,公元190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保存较多,已经整理出来的就有1000余首,内容包括写景咏怀、批评时政、民风民情、征夫疾苦、士子不遇、男女爱慕、闺阁幽怨、宗教哲理、为人处世、英雄故事、神异传说等,涉及范围相当广泛。唐人崔令钦《教坊记》记录当时流行的曲名有325个,但见于敦煌曲子词者仍有一些没被收进去,其他音乐书也不见录。如《别仙子》《恭怨春》《郑郎子》《阿曹婆》等,这或许只是流行于敦煌的区域性曲子。甘肃各地、各族,此类民间曲子或歌曲非常丰富。唐人耿纬《凉州词》写道:“国使翩翩随旆旌,陇西岐路足荒城。毡裘牧马胡雏小,日暮蕃歌三两声。”宋·郭茂倩辑《乐府诗集》卷80)反映的就是陇西胡族小孩以蕃歌曲子为伴的情景。

曲子有只唱一遍的只曲,又叫单遍,如敦煌文中发现的唐五代的《望江南》《菩萨蛮》等;也有用两个(叫双遍、双阙)或多个只曲相联,用同一曲调演唱多种歌词。其中用几个不同只曲联接成的大型套曲就是大曲。

大曲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出现。《宋书·乐志三》著录有大曲十曲,主要是用流传的诗篇配合乐曲,增减字句,以合音律。唐代大曲的歌词也多是入乐叠唱的诗句。传统的乐或乐舞虽然也包括乐曲、乐词、舞蹈和乐器等部分,但相比之下,大曲有“套”,而民歌、只曲、杂曲则没有,这就使大曲乐舞的内容更丰富,形式更复杂,情节也更加曲折。

隋唐大曲既吸收民间曲子新鲜、活泼、明朗的风格和特色,又继承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综合各地、各族、各种乐曲优点的传统,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南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引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14的话说:“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,而以州名者五:《伊》《凉》《熙》《石》《渭》也……其实从西凉府来也。凡此诸曲,唯伊、凉最著,唐诗词称之极多。”

以上洪迈所了解的五个以州命名的大曲,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,熙州是宋朝出现的地名,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,唐代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。这三种大曲主要来源和流行于甘肃境内。

据《旧唐书》卷29《音乐志二》记载:自后周、隋以来,管弦杂曲有数百曲,多用西凉乐。鼓舞曲多用龟兹乐,其曲度为时俗所知。列入唐宫廷10部乐中的“西凉乐”,是北凉沮渠氏所得,传入魏都平城(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)。晋、宋末,中原丧乱,张轨据有河西,苻秦通凉州,不久河西与中原又相隔绝,限制了其乐流传。西凉乐的乐器有钟磬,为凉州所传中原传统乐器,配合羌胡之声演奏,北魏、隋朝都很流行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以地名或民族命名的大曲或杂曲,如《甘州大曲》《酒泉子》《敦煌子》《定西番》等。婆罗门法曲也是从西域经新疆、甘肃传到关中、长安的。唐代著名的《霓裳羽衣曲》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给唐玄宗的。

唐代陇右大曲中最先出、最著名的是《凉州大曲》。它是在西凉乐的基础上,吸收印度佛曲,用凉州乐的舞蹈、乐器,配诗填词,叠唱而成,能表达复杂的艺术内涵。河西、西域向来是少数民族乐舞最发达的地方之一,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,今新疆是第一站,河西是第二站,因而也最早与当地的传统音乐相结合,形成新的乐舞艺术。其形成的具体时间应当在唐玄宗开元、天宝(公元713年—756年)年间。

散乐是唐人在传统百戏(寻橦、跳丸、吞刀、吐火、旋盘、筋斗等杂技)的基础上,增添歌舞戏、参军戏、杂剧等而形成的歌舞艺术。隋唐散乐中新添的歌舞戏,是边唱边舞,或边唱边加动作表演,并用乐器伴奏的戏曲。《踏摇娘》《五方狮子》都是这一时期知名的歌舞戏。表演时由人化妆成狮子模样,每狮有12个手执红拂的人导引跳舞,同时有笛、拍板、羯鼓、鸡娄鼓等乐器伴奏,是由舞蹈、表演和乐器伴奏组成的表演形式。

参军戏的“参军”,本是官名。此戏是在音乐伴奏下表演的小型戏剧,唐代宫廷和民间都很流行。参军戏最早表演的内容为一人扮被嘲弄的贪官——东汉石耽或十六国后赵的周延(人名),这个角色就叫“参军”。另一人扮嘲弄者“苍鹤”,扮石耽者一般穿白衣衫,扮周延的角色扎头巾,穿黄绢单衣。最早表演的剧情是由“苍鹤”嘲讽“参军”,问他何以被罚为伶人?“参军”作答,表演比较单调。后表演内容和技艺不断改进,到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间(公元785年—公元820年),参军戏的戏剧元素包括唱、表演、对白和鼓与管弦乐器的



莫高窟第220窟唐代壁画《乐舞图》

伴奏等。唱腔一般都取自当时流行的民歌、曲子和大曲,其音乐则全部来自唐代的《六么》《伊州》《梁州》等大曲。此戏在甘肃广泛流行。

杂剧是唐人对具有不同特点的表演艺术的一种新叫法,如“百戏”。唐后期已有“杂剧”这个戏曲名。如唐文宗时,李德裕奏文中提到成都被

俗讲僧首先用韵文演唱一段,又用白话文讲一段,然后正式开始说唱,唱时手里还用手鼓、铃、小钹等乐器伴奏,文艺性很强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宗教界就已经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将俗讲改编成“转读”“唱导”等艺术形式。唐代僧侣沿袭这一做法,进一步创作俗讲,使其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。俗讲时还有一些宗教仪式,如开讲时,讲僧登上高座,先作“梵音”,后念几声“菩萨”,再说“押座文”,然后开讲,叫作“开经”。讲唱完毕,念佛赞,发愿结束。

唐代俗讲不仅在佛教寺院中进行,一些道观中也有俗讲。讲的人也不光是僧道,还包括有讲唱艺术才能的家居信徒。讲唱内容也超出宗教范围,掺进了一些世俗故事,如《张议潮变文》等。听众有的是出于信仰,而多数则是图热闹。

总之,隋唐散乐、俗讲、说话等都已经具备“表演”“故事”“文学”“音乐”“舞蹈”等戏剧元素,这一时期已出现专门、固定的戏剧表演场所——看戏场。中国戏剧艺术还处于形成期或萌芽状态,甘肃在这一过程中有突出的贡献。

俗讲本是僧侣宣传佛本生、佛传和佛经内容的一种通俗讲唱形式。

## 甘肃乐舞艺术的历史贡献

隋唐时期甘肃乐舞艺术的贡献,一是丰富了宫廷乐舞。隋唐宫廷乐包括雅乐(祭祀用)、燕乐(九部、十部乐)、散乐(如百戏)、四方乐(四夷乐)等。最高统治者把演奏四方乐即少数民族乐舞看作政治稳定、民族和谱、国泰民安的一种表现,因而宫廷乐很重视吸收大量的地方、民族乐舞艺术,经宫廷乐工、文士、官员的加工提炼,创作出水平更高的新乐舞。

唐人杜佑在叙述《清乐》时说:“自周隋以来,管弦杂曲将数百曲,多

用《西凉乐》。”(宋陈旸《乐书》卷184)著名的《霓裳羽衣曲》,原是从印度传来的,初名《婆罗门曲》,传入凉州后又与西凉乐相结合,唐玄宗开元中(公元713年—741年),凉州节度使杨敬述将其献给朝廷。经过唐玄宗的加工润色,定为十二遍。唐玄宗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年),唐玄宗令将《婆罗门曲》改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这一发展过程,包含甘肃官员和艺人的贡献。

二是从甘肃传到中原内地的民间乐舞也不少。如从西域传

到河西、陇右,再传到中原内地的健舞、软舞、字舞、花舞、

马舞、《胡旋》《胡腾》《柘枝》

《棱大》《阿连》《剑器》等健舞曲,

《绿腰》《苏合香》《屈枳》

《团圆》等软舞曲,都极受内地官民喜爱。

三是为唐宋词作提供了艺术营养。

曲与歌词结合,有一个合拍的问题,诗体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要,所以就出现按曲拍填写的长短句,出现按曲调调整的韵律。这一风气萌芽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(公元713年—公元756年),长久地流行于后世。按曲牌填写歌词、长短不齐而又押韵的所谓“长短句”,是唐宋词的滥觞,这种曲子词的最早代表作是《凉州词》。原先学者将词的源头寻找到了白居易同刘禹锡之间的唱和。自从敦煌文书发现《云谣集杂曲子》(简称《云谣集》)后,文学史界开始改变这一看法。《云谣集》编成于五代后梁时期(公元907年—公元923年),包括30首词,有典型的曲牌,如《菩萨蛮》《更漏长》《破阵子》《倾杯乐》等,体现了甘肃先民对中国词文学的贡献。

四是哺乳了元明戏剧艺术。古代乐一般都包括舞,无须分别称呼。如宋人王灼所说:“隋以来,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,至唐稍盛,今则繁声淫奏,殆不可数。古歌变为古乐府,古乐府变今曲子,其本一也。”(《碧鸡漫志》)

戏剧以演艺为主,有说白、歌唱、表演、器乐、舞蹈等艺术形式,涉及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雕塑(亮相、定型)、绘画(脸谱、服饰、舞台背景)、武术、杂技等诸多文艺、技术领域,是一门庞大的综合性艺术。戏曲的曲文是从散文、诗词发展而来,其故事情节又受到当时流行“话本”的影响。院本与杂剧相似,因其脚本是“行院之本”(金元人对倡优居住区的称呼)而得名。作为宋金说唱艺术的诸宫调——用不同宫调的曲牌联套演唱并夹杂一些说白的表演形式,已能演出长篇故事,是戏剧的雏形。



天水市出土的唐代陶质参军戏俑



庆城县出土的唐代陶质参军戏俑

时所重。一种地方乐舞曲,能在中原乃至京师红火起来,使其他乐舞曲“为之少寝”,那艺术感染力确实不小。

甘肃乐舞除被吸收改编为隋唐宫廷乐,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播,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外,还流传到周边民族地区,成为各族上层的迎宾乐舞曲。据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记载,唐穆宗长庆元年(公元821年),唐朝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,至赞普夏牙(吐蕃赞普夏天居住的地方),受到吐蕃上层的热烈欢迎。“饭举酒行,与华制略等,乐奏《秦王破阵曲》,又奏《凉州》《胡渭》《录要》《杂曲》《百伎》,皆中国(原)人。”甘肃各族的民间乐舞也彪炳于史册。唐人耿纬《凉州词》中写的“毡裘牧马胡雏小,日暮蕃歌三两声。”(康熙《御定全唐诗》卷27)传达的正是甘肃等西北各族牧马儿喜欢唱“蕃歌”的信息。